

蒋介石与战后日本天皇制

陈奉林

(外交学院 外交学系, 北京 100037)

摘要: 战后日本天皇制的保留, 是由当时复杂的国际形势决定的。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对日本天皇制所持的保留态度极为重要, 影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此问题上的决策; 正是由于中美两国在天皇制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故而《开罗宣言》没有涉及日本的国体问题, 为后来天皇制的保留提供了一个存在的基础。当然, 美国出于自身战时与战后的需要, 特别强调一个完整、统一的日本对它在亚洲战略的重要性, 在日本天皇制的保留上起了决定性作用。

关键词: 蒋介石; 美国; 日本天皇制; 开罗会议

中图分类号: K265; K31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59 - 8095 (2003) 04 - 0077 - 07

日本天皇制问题, 是战后日本历史研究乃至国际关系史研究中饶有兴味的问题。天皇制之所以能被保存下来, 是当时美、中、日三国相互作用的结果, 其中美国的作用至关重要, 而中国的作用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应该指出, 在国内学术界, 几乎很少有人研究中国对于日本天皇存续的影响, 而是过多地关注美国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一、日本天皇与侵略战争

关于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问题, 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 天皇并不是战争的直接发动者, 战争的推动者是政府和陆军部, “天皇不亲政” 乃是天皇制的原则。支持这一观点的是《天皇》一书的作者石井良助;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 天皇居于日本统治者的核心地位, 集行政权、军事权、神权于一身, 长达 14 年的侵华战争如果没有天皇的批准与支持, 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 其代表性著作是《天皇的战争责任》。

根据裕仁天皇的敕谕、御前会议记录以及日本的外交文书可以确断,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所有重大军事活动都是得到裕仁天皇批准与支持的。裕仁早在摄政后的 1925 年, 就曾派遣驻朝鲜的日军进入中国东北, 援助张作霖以对付倒戈的郭松龄。这次出兵是其摄政以来对中国侵略的第一次。1931 年, 裕仁天皇制定出了一个庞大的军事计划, 即控制“满洲”使其势力日后能沿中国海南南下, 直到控制新加坡一线的战略据点。^[1] (P549) 历史证明, 战争确实是按着这个计划发展的。“九·一八”事变以后, 裕仁天皇于 1932 年 1 月 8 日发布“敕语”, 对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军事行动表示嘉许, “敕语”说: 关东军将士“或于嫩江、齐齐哈尔地区, 或于辽西锦州地区, 冲风冒雪, 英勇奋战, 以铲除其(匪贼)祸根, 扬皇军威武于海外”, “朕深嘉许其忠烈, 尔等将士应更加坚忍自重, 以确立亚洲和平

收稿日期: 2003 - 06 - 28

作者简介: 陈奉林 (1962 -), 男, 辽宁朝阳人, 历史学博士, 外交学院外交学系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东北亚史、东方外交史。

之基础，务其不负朕之信赖”。^[2] (P173) 据说“敕语”里首次使用“皇军”一词，此后“皇军”一词很快在社会上传播开来。由于得到天皇的嘉许，关东军受到鼓励，在中国的军事行动进一步扩大，坚定了吞灭整个中国的野心。

天皇时刻影响着中国战争的进程，以其特殊的身份发挥作用。1937年7月日本对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天皇召见了参谋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经过慎重讨论之后，批准了参谋本部和政府关于向华北派遣大军的方案。对于日军在华北、内蒙地区的侵略活动，裕仁天皇于11月发布“敕语”予以嘉许鼓励，“敕语”中说：“华北及内蒙作战部队之将士，攻克敌阵，所向披靡，宣扬皇威于国内外，朕甚赞其忠烈。望继续磨砺斗志，克服艰难，以不负朕之信赖。”^[3] (P129)

为全面推进侵华战争，裕仁天皇于1937年11月在皇宫内设立大本营，作为对外侵略的最高军事统帅部。1938年11月11日，裕仁天皇出席政府和大本营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了《中国事变处理根本方针》。1940年7月22日，近卫文麿按天皇的指令组成第二次内阁。近卫内阁在《关于加强日德意轴心的问题》中进一步明确了瓜分世界的企图：“作为生存空间所应考虑之范围，乃以日满华为本，并包括旧德属委任统治诸岛、法属印度和太平洋岛屿、英属马来、英属婆罗洲、荷属东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澳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度等。”^[4] (P371) 日本在法属印支北部地区的侵略行动，加剧了与英、法、美、荷等国的矛盾，引起美国对日本的物资禁运，美日战争在即。9月27日，裕仁天皇发布诏书，强调“宣扬大义于八紘，使坤舆为一宇，实皇祖皇宗之大训，乃朕夙夜眷眷所不敢怠慢者”；号召“尔臣民愈益明征国体之观念，深谋远虑，戮力同心，克服非常之时局，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4] (P371 - 372) 不难看出，天皇的意志是与内阁和军部的政策形影相随，与日本的侵略战争相始终的。

天皇对侵略战争的直接参与，还表现在对太平洋战争的筹划与决策上。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裕仁天皇多次召开御前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为战争更有胜利把握而作精心准备。1941年7月2日天皇主持召开御前会议，会议通过《伴随形势发展的帝国国策纲要》，确立了“不惜对英美开战”的目标。这时期欧洲战争爆发已近二年，英、法、荷等国正忙于欧战，无暇东顾；为了蒙骗美国，日本以谈判为掩护加紧作战争准备。9月5日，裕仁召见杉山元陆军参谋总长和永野修身海军军令部总长，首先对两总长说：“要尽量通过途径加以和平解决，不要外交与战争准备并行，要使外交先行。”天皇还就作战计划、船只、天气影响作了询问。^[5] (P76) 裕仁向杉山参谋总长询问了战争时间问题，说：“日美一旦发生战争，陆军确认多长时间能够解决？”杉山说：“若仅在南洋方面，我估计三个月即可解决。”裕仁说：“中国事变爆发时你是陆相，我记得你说过‘事变一个月就可以解决’。但经过了四年之久，至今不是还没有解决吗？”^[6] (P156) 裕仁与杉山所讨论、所关心的是战争需要的时间问题，在没有绝对取胜把握时天皇是反对冒险战争的。这一点十分清楚。

9月6日，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实施纲要》。《纲要》的第一项规定“在职10月下旬之前作好对英美开战的准备”；第二项规定“与此同时通过外交手段努力贯彻日本的要求。以战争准备为主，外交途径为辅。”这两项内容得到裕仁天皇的同意。12月1日，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对英美开战”的最后决议。12月8日，日军以偷袭方式发动了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珍珠港事件的偷袭方案是由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拟定，天皇决定的。裕仁天皇在同一天的《对英美两国宣战诏书》中说：“朕对美英宣战。朕之陆海官兵全力奋战，文武百官奉行职守，庶民各尽本分；亿兆一心，举国家之总力，以期达成征战之目的。”^[2] (P193) 据井上清讲：“天皇为了下最后的决心，他研究了外交、军事方面的所有情况，反复听取了当政者各个方面的意见，弄清了海军方面的真实想法，在这个基础上，他才做出了开战的决定。”^[7] (P139)

根据上面的实例可以得出结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14年时间里，几乎所有的重大军事行动与策划，或是得到天皇的批准，或是在御前会议上做出的，裕仁天皇对战争负有直接的责任。对于这一点，裕仁本人也承认。曾任对日占领军最高统帅的麦克阿瑟在其回忆录中谈到，裕仁与他第一次会谈时说过：“我是作为对我国人在进行战争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所做出的一切决定和采取的一切行动负完全责任的人来到这里的，是向你所代表的那些国家投案并接受审判

的。^[8] (P183) 河原敏明在《日本天皇——裕仁》一书也有同样的记载：“我（天皇）对因为日本推行战争而发生的一切问题和事件，负有全部责任，我对所有的军事指挥官、军人、政治家以日本的名义做的事情，负有直接责任。……总之我要负全部责任。”^[9] (P170) 裕仁的战争责任已昭然若揭。

二、抗战期间蒋介石对天皇制的态度

抗战期间蒋介石对日本天皇制所持的维持态度，主要表现在由中、美、英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上。为了配合、协调与部署亚洲战场上的对日作战，早日打败日本，经过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筹划与多次邀请，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率中国代表团 20 人赴埃及首都开罗，参加由中、美、英三国首脑于 1943 年 11 月 22——26 召开的开罗会议。由于开罗会议是二战期间协调盟国对日作战的重要会议，而且是盟国十几次高级会谈中唯一有中国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因此在中国外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943 年 11 月 23 日晚，罗斯福总统与蒋介石举行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会谈。参加会谈的人除了罗斯福、蒋介石外，还有罗斯福总统的秘书霍普金斯和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秘书长王宠惠。会谈中已为中、美两国同意的的问题包括：日本攫取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问题，永远剥夺日本在太平洋所强占的岛屿问题，战后朝鲜独立问题，日本天皇制存废问题，战后中国接收日本在华公私产业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又都是战后中、美两国对日政策中必须解决而不可回避的问题。罗斯福就日本天皇制存废问题征询了中国的意见。蒋介石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首先从根本上消除日本军阀，不能再让军阀干预日本政治。但是，至于其国体（国家形态）如何，等到日本新时代的觉悟的人来解决为好。”“如果日本国民起来对战争元凶的军阀革命，打倒现在的侵略主义的军阀政府，彻底根除侵略主义的根株，那么我们就应该根据日本国民的自由意志，尊重他们选择政府的形式。”^[10] (P377)

对于此事，还有一个权威的记载，就是中国对开罗会议的记录。该记录记载在罗斯福就日本皇室存废问题征询蒋介石的意见时，蒋介石说：“此次战争之祸首，为日本军阀。我以为除了军阀必须根除，不再让其干预日本政治以外，至其国体如何，最好待战后由日本人民自己来决定，同盟国在此次大战中，不要造成民族间永久之错误。”^[11] (P0011) 蒋介石对日本战后天皇制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罗斯福。尽管早在 1943 年 8 月曾任美国驻日大使的格鲁就提出了保留天皇制的主张，但并没有引起罗斯福太大的注意。要知道，蒋介石是作为“四大强国”的首脑参加会议的，其作用无疑是重要的。在蒋介石看来，“日本民族的精神构造上，天皇占有怎样的位置，西洋人并不理解，同样的东洋人——中国人，是容易理解的。”^[10] (P377) 罗斯福对此表示赞同。至少在 1943 年 11 月开罗会议召开之前，罗斯福对天皇制的存废问题尚无一个成竹在胸的想法。从当时的形势看，1943 年美日战争正酣，罗斯福所考虑的是尽快打败日本，减少美国的伤亡，早日结束战争。

罗斯福与蒋介石会谈还涉及到要不要把天皇制存废问题提到开罗会议上讨论。罗斯福就此问题再次征询了蒋介石的意见，蒋介石认为：“不必”。罗斯福对此予以赞同。据说 11 月 24 日下午霍普金斯在拟订《开罗宣言》初稿时，仍有“废除天皇制”的字句，经中国王宠惠秘书长校出，呈经蒋介石转请修正，才将“废除天皇制度”字句删除。^[12] (P111 - 112) 正是由于事先中、美两国在天皇制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所以《开罗宣言》中没有涉及日本的国体问题，为后来天皇制的保留提供了一个存在的基础。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发表对开罗会议之感想，说：“此次在开罗逗留七日，其间以政治收获为第一，军事次之，经济又次之，然皆获得相当成就。……以罗斯福总统此次言行，虽确有协助我国造成独立与平等地位之诚意，如今我国若不能奋发图强，则一纸空文仍不足以凭；故必须国人共同努力奋勉，方能确保外交胜利之果实。”见台北国史馆藏：特交文电，领袖事功之部拾伍，领导对日抗战 4/4 开罗会议，0015。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对开罗会议也有论及：“在开罗会议中，我力主日本天皇制的存废，应依其人民的意愿而决定的主张。罗斯福总统亦能谅解此意，乃赞成此议。到了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军队在国外各地均能遵照其天皇的命令，缴械投降。同时日本国内秩序，亦以其天皇之为维系，得免于混乱与破坏。”见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 [M]·卷九，p115。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对日本天皇制所持的保留态度，是天皇制得以保留的重要因素。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发表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把日本国家政体的选择权利留给日本人民自由处理。由于这两次会议都没有把天皇制问题作为会议的正式议题提出，从而为天皇制的存续提供了一个先决条件。应该说，决定天皇命运的中国因素当中不止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一人，原国民政府外交次长王家楨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据王家楨讲，1944年秋到1945年夏，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赴美商谈成立联合国和联合国成立仪式住在旧金山。美国当局把他视为“日本通”，曾就战后日本天皇该不该保留问题听取他的意见。王家楨认为保留比取消利多害少，通过天皇这个精神支柱统治战后的日本，比美国直接统治有利得多，引起的麻烦要少得多，建议美国保留天皇制。溥杰先生说过，美国人接受了王家楨保留日本天皇的建议。^[13] (P3) 显然，王家楨的态度与蒋介石的态度是相同的。这也就意味着，中华民国政府对战后日本天皇制持保留态度。

1945年1月邵毓麟以中国代表身份出席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市召开的太平洋学会会议，该会议的主题是《如何处理战后日本》。会后他游说美国国务院代理国务卿格鲁和战时情报局的首脑，向他们转达中国在战后日本天皇制保留问题上的态度与看法，当格鲁问及“阁下的意见是不是可以解释做蒋委员长的意见？”时，邵毓麟回答：“不错，我不过是重申蒋委员长的意见而已。”^[14] (P29) 1945年8月12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委员会审定的《处理日本问题意见书》中有这样一条：“日本天皇及整个皇权制度之存废问题，在原则上应依据同盟国共同意见办理。先从修改其宪法入手，将天皇大权交还于日本人民；其有违反民主精神者，则应予以废除。”^[15] (P638) 应该说，中国对日本战后社会民主改革是有明确设想的。遗憾的是，国共内战爆发后蒋介石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国内的共产党与民主运动上，没有对日本战后的民主改革发挥出作用。

蒋介石何以主张保留日本天皇制、把自由选择政府的权利交给日本人民呢？无论是从维护战后日本社会秩序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天皇在日本国民中的神圣地位来考虑，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在研究日本天皇制时，首先不能不对其在日本国民心目中的特殊地位给予足够的重视。自从7世纪初日本历史上正式出现“天皇”称谓以来，千余年来天皇一直是日本人心中的偶像，深深扎根于人们的观念当中，与人们的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密切相关。天皇是“神”成为人们共同的心理，没有天皇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这种虚构的观念统治长达十几个世纪，并成为人们的心理定势。对此颇有代表性的研究当属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者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书。本尼迪克特1944年6月受美国政府委托对日本进行研究，“以求弄清日本民族是什么样的民族”。^[16] (P2) 经过研究她得出的结论是：“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如果我们向天皇的神圣性进行挑战并予以摧毁，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坍塌。”“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或者攻击天皇，更会刺激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了。”“日本没有天皇，就不是日本。”“纵然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崇天皇。”^[16] (P22-23) 本尼迪克特的著作对美国的对日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曾经担任过美国驻日大使、以研究日本历史见长的埃德温·赖肖尔在《日本人》一书中这样写道：“人们对天皇家系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尊敬。在现代社会以前，没有一个人对于一切合法的政治权威归根到底来自天皇家系这一观念进行过挑战。”“战前的日本人对作为其民族统一象征的天皇的崇拜，大概要算是这种现代民族现象的最极端的例子。”^[17] (P265, 267) 即使在战争结束后的1945年年底，日本国内支持天皇制的人数比例仍然是相当高的。据日本舆论调查研究所就国民对天皇制所持态度的调查，支持天皇制者占61.3%，反对者只占8.7%。

蒋介石不否定天皇制，同样是因其意识到天皇制的存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蒋介石曾指出：“因为战争胜利而干涉一个独立国家的国体，决不是明智的政策。”^[10] (P377) 他特别强调战后日本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不止一次地讲过：“对于日本国民来说，天皇制是精神支柱，中国人民对东洋道义的传统精神上的关照是能够理解的。如果在战后混乱时期根据占领军的命令废除天皇制的话，日本国内就陷于混乱”。^[18] (P94-95) 在1944年元旦的广播中，蒋介石提到在开罗开会时与罗斯福的会谈，再次说明：“战后日本国体问题应由该国自己选择”，“这个问题，我以为除了日本军阀必须根本铲除，不能再让其将来预问日本政治以外，至于他国体如何，最好待日本新进的觉悟分子自己来解决

决。^[19] (P20) 1945年7月17—8月2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德国柏林市郊的波茨坦举行会议。这时期欧洲战争已经结束,亚洲战场上的日本还在顽抗。由于当时苏联尚未参加对日作战,中、美、英三国首脑未与苏联商量便于7月26日发表了《中美英三国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公告》继承开罗会议期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时提出的“政治形态的民族自决”的主张,确定了“上述目的达到及依据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志成立一倾向和平及负责之政府后,同盟国占领军队当即撤退”,并对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的战后对日处理原则。可见《公告》并没有涉及日本的国体问题。由此观之,《波茨坦公告》显然是受到了蒋介石“政治形态的民族自决”主张的深刻影响。

综观蒋介石抗战期间维护日本天皇制的言行,可以看到这是蒋介石欲在战后稳定日本、使其免受革命危机的重要步骤,也是防止苏联“赤化”日本的重要步骤。这个步骤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一是稳定的日本对中国的重要性,可以借助日本完成他念念不忘的“剿共”、反苏事业;二是天皇制度的遗产。这种遗产使他不得不从现实出发,通过权衡利弊而采取比较实际的政策。台湾学者林金荃博士对此有精辟的见解:“此天皇制的存在对于化成废墟的日本,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到底具有何等复兴的功能,其后的历史事实可资证明。假如在战后的混乱时期,凭占领军的一纸命令而废止了天皇制,则日本国内必将陷于无可名状的混乱情况。”^[20] (P26) 战后初期中国国民政府对日采取的“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的政策,也可以看作是这一步骤的延伸。

从中国自身来看,参加开罗会议,并作为“四强”之一与其他大国一起处理国际事务,在重大国际问题上有了发言权,标志着中国开始走向大国行列,无疑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与民族自尊,是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另一方面,蒋介石对日本天皇制所持的保留态度,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拯救了天皇制。然而,天皇制的保留也产生出一些消极后果,战后裕仁天皇没有受到审判和战争责任追究,随着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许多被判了刑的人获释后又纷纷返回日本政坛,有的甚至做了首相。日本战后之所以右翼势力得势,与此无疑有直接的关系。

三、美蒋合作与天皇制的保留

战后日本天皇制之所以被保存下来,是众多因素互动的结果。关于保留日本天皇制的决定因素,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中国的作用,另一个是美国的作用。有关中国的作用已在前面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以下简略扫描美国所起的作用。

美国对战后日本天皇制的保留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早在1942年末,美国国内就有人建议政府考虑利用天皇的影响来结束战争,以减少美国军队的伤亡。代表人物是原美国驻日大使、后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的约瑟夫·格鲁和杜曼等人。格鲁强调天皇制是“最终的最实际的手段”,“涉及影响安定的唯一政治要素”。^[21] (P304) 他们凭借驻日多年的经验,向罗斯福总统力陈狂热的日本民族具有为天皇血战到底的可能性,如果处理不好就会给美国带来巨大损失。1944年格鲁在会见美国太平洋方面最高司令官尼米兹时,向他强调:“为了使日军无条件投降,天皇是必要的。也许日本人、日本军人唯一喜欢的声音就是天皇的声音。换句话说,天皇是拯救数万美国人生命的源泉。”^[22] (P6) 随着战争推进和日本的抵抗更加激烈,美军伤亡增多,格鲁和杜曼的建议逐渐受到重视。

1945年5月,格鲁向对日本持强硬态度的参议院说明:“天皇是唯一能使日本稳定的力量,只有天皇有足够的力量强制日军停止在中国的战斗,而靠军部首脑是无法使日本彻底投降的。如果不支持天皇,我们会背上沉重的包袱,无限期地管理面临崩溃的7000万人口的社会。”^[3] (P222 - 223) 28日,格鲁在与总统顾问罗兹曼商议后,向杜鲁门总统献言,说:“日本拒绝无条件投降的最大障碍,是天皇和天皇制的破坏与永久性废除。”“允许战败后日本人未来的政治形态由他们自己解决,找回因投降而失去的面子。”^[22] (P19) 7月7日,时任副国务卿的格鲁主持会议,讨论美国政府关于日本投降后的天皇制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格鲁极力主张:“废除天皇制,是绝对不可能的。对战争应该负责的

是军部，而不是天皇。所以最重要的事，是彻底瓦解军事机构与财阀。¹²³¹ (P62) 美国以“不废除天皇制”为诱饵，促使日本投降。由于美国对日促降具有浓厚的“绥靖”色彩，故使日本在接受《波茨坦公告》时加大了讨价还价的砝码。8月9日上午，日本最高军事会议提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四个附带条件，其中之一就是保证维护日本国体。10日上午7时，日本政府通过瑞士临时代办向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发出照会，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但同时必须得到盟国“谅解”，“即上述公告并不包含任何有损于陛下作为至高统治者之特权的要求”。贝尔纳斯奉杜鲁门之命，代表美英中苏四国对日本照会发出答复：“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于盟国最高司令官”，“日本天皇必须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能签字于必需之投降条款，……日本政府之最后形式将依日本人民自由表示之意愿确定之。”¹²⁴¹ (P733 - 734) 经过乞降与诱降的交易之后，日本天皇制原则上被确定下来了。这天上午9时，杜鲁门总统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日本提出的投降条件——保留天皇制问题。陆军长官斯契姆逊和杜鲁门总统顾问利赫在会上提出“为了使日本投降利用天皇是最有效的。不，只有天皇才能使日本军队投降。”¹²⁵¹ (P221) 他们的意见得到杜鲁总统的支持。

战争结束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以“盟军”的名义于8月30日来到日本，对日本实施了独占。美国政府之所以不顾苏、英、澳等国的强烈反对而坚持保留天皇制，是与其对外政策的转变分不开的。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后，美苏两国各自开始构建自己的东方战略。美国力图通过日本控制亚洲，遏制苏联的扩张。实际上，美国在东方遇到的麻烦远比欧洲复杂得多。麦克阿瑟恰好充当了美国亚洲政策的执行者与代言人的角色。麦克阿瑟刚到日本不久，得知苏、英、澳等国要求将天皇列为战犯时，担心这种行动“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就对这种做法加以坚决的抵制”，并认为“如果天皇作为战犯受到控告或被绞死，那么整个日本就必须建立军事管制政府，而很可能爆发游击战争。”¹⁸¹ (P183) 基于这种考虑，裕仁天皇的名字很快从战犯的名单上勾销了。不仅如此，麦克阿瑟还夸大其词说，为了对付因审判天皇可能出现的游击骚扰，起码需要100万军队和数十万行政官员。

麦克阿瑟认为，战后日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社会控制问题，因为原有的社会控制结构、家庭，特别是社会经济遭到破坏，社会面临解体的威胁。因此要实现社会的平稳过渡与长治久安，为实现美国的长远战略目标服务，必须找到一个有效途径。这个途径就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天皇，通过天皇凝聚社会与人心，减少社会动荡。在第一次拜访之后，裕仁就给麦克阿瑟留下了“日本第一绅士”的印象。经过裕仁的多次拜访这后，麦克阿瑟确信“他在振兴日本精神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他的真诚合作和影响对占领的成功是大有关系的。”¹⁸¹ (P184) 作为占领日本的“太上皇”，麦克阿瑟的态度是异常重要的，他执行美国的对日政策，反过来他又对美国的对日政策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10月6日，美国政府向麦克阿瑟发出指令：“不得采取排除天皇或类似排除的任何措施。”¹³¹ (P265) 天皇制就这样被保存下来了。为了使日本适应美国远东扩张的需要，从1945年9月起，“盟总”对日本进行了民主化改革。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1946年颁布了新宪法。《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乃国家之象征，为日本国民统合之象征”。尽管天皇已不是从前绝对意义上的君主，但是他还是作为统而不治的虚君被保存下来了。

天皇制的保留是多方面妥协的结果，既有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的作用，更是出于美国减少战争牺牲、通过日本遏制苏联，以实现战后扩张的战略考虑。美国接受了在德国分裂问题上的教训，意识到独占日本是限制苏联势力扩张的关键，保持一个完整、稳定的日本对美国东亚战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日本问题上不肯对苏联做出半点让步。下面的一些因素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即将到来的苏美对立；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从亚洲退出后出现的权力真空需要填补；日本因战败混乱可能受到共产主义影响；中国国内国共两党对中国政治权力的争夺，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使日本问题具有了一揽子解决的显著特征。日本历史学家祢津正志对此有深入的分析，他指出：“废除天皇制和让天皇退位好像是逼迫美国 and 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退位，这种结局不是美国所乐意接受的。”“美国最担心的是共产主义而不是世界舆论。为此美国便想方设法利用日本人尊崇皇室的心理，只有这种心理才能筑起反对共产主义的最坚强的堡垒。在这点上，与惧怕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天皇是一致的。”¹³¹ (P272) 这段话是

我们理解美蒋合作维持日本天皇制的最好解释，而历史的发展恰好给当时的形势作了最好的注脚。

参考文献：

- [1] [美] 戴维·贝尔加米尼. 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 [2] [日] 真藤建志郎. 天皇诏敕选集 [M]. 东京：日本实业出版社，1986.
- [3] [日] 祢津正志. 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 [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 [4] [日] 信夫清三郎. 日本政治史：第4卷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 [5] [日] 千本秀树. 天皇的侵略责任与战后责任 [M]. 东京：青木书店，1990.
- [6] [日] 义井博. 昭和外交史 [M]. 东京：南窗社，1984.
- [7] [日] 井上清. 天皇的战争责任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 [8] 麦克阿瑟回忆录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 [9] [日] 河原敏明. 日本天皇——裕仁 [M]. 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86.
- [10] 蒋介石秘录——日中关系八十年证言：下册 [M]. 东京：产经新闻社，1985.
- [11] 台北国史馆藏：特交文电，领袖事功之部 15，领导对日抗战——开罗会议 [Z].
- [12] 染敬揆. 开罗会议 [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
- [13] 高殿芳. 王家楨与田中奏折 [J]. 东方世界，1988，(3).
- [14] 张桂芳. 蒋总统与日本天皇制 [M]. 台北：兴台印刷所，1968.
- [15]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七编战后中国（四） [Z].
- [16]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 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17] [美] 埃德温·赖肖尔. 日本人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 [18] [日] 松本 彦. 台湾海峡的桥梁 [M]. 东京：三弥井书店，1996.
- [19]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整编. 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第63卷 [Z].
- [20] 台湾中日关系研究会. 日本研究 [J]. 第221期.
- [21] [日] 栗原健. 天皇——昭和史备忘录 [M]. 东京：原书房，1985.
- [22] [日] 儿岛襄. 天皇与战争责任 [M]. 东京：文艺春秋社，1988.
- [23] [日] 大久保传藏. 一页珍贵的历史 [M]. 台北：海外出版社，1969.
- [24] [英] F·C·琼斯、体·博顿. 1942 - 1946年的远东：下册 [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 [25] [日] 菊池久. 天皇陛下与麦克阿瑟 [M]. 东京：山手书房，1985.

责任编辑：宋 鸥

increasingly identified by European patients and doctors.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1929-1933 and London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

JIN Wei-xing (69)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1929 - 1933 destroyed the world economic structure reconstructed after World War I. London world economic conference convened by the League of Nations for reviving the world economy, became the turning point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world economic system. The U. K. attempted to come back the traditional order of world economy led by itself through having the aid of American finance strength. However, the U. S. expected to finish the traditional order of world economy led by the U. K. and set up a new global economic order. No agreement on substantial issues have been reached eventually. The reason why the conference had failed is that the U. K. and the U. S. had different thoughts in cooperating with each to deal with the crisis. However, the failure of this conference laid a foundation for the U. S. to construct the world trade and finance cooperation mechanism which was dominated by itself.

JIANG Jieshi and the Emperor System of Japan after World War II

CHEN Fen-lin (77)

The preservation of emperor system of Japan was determined by the complex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t that moment. It was very important for JIANG Jieshi to agree to preserve the emperor system during the Cairo Conference, which had influenced the U. S. president Roosevelt's decision on this problem. It was just because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got a common understanding on the issue of emperor system, the polity of Japan were not involved in the Cairo Declaration, which provided a bas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emperor system afterwards. Of course, because of the necessity during and after the war, America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a complete and integrated Japan in its Asian strategy, and America played a decisive role on this matter.

On the World History Studies in the Ligh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CHEN Zhi-qiang (84)

The world system before 1500 were not formed.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comes from the changing world after the end of the 15th century, with the new theory of the world history. The system of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as formed in the 17th century. The two systems were the consequences of revolution in the modern times, with the notable remark of frequent relations among nations. In other words, the world system and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re the results of industrialization or globalization. So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tudies and world history studies have the same observation and background, against which both of them grow up. Scholars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tudies pay their attention to the control power or balance power among the nations, while the historians of the world history focus on the procedure of the world system formed. It is reasonable to believe that entity and essential problem of the world history deal with the natural resources and living environment, which is also the basic and elementary core or kerne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studies.

The Renov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ing Tools in the Internet Era : The Applications of Academic Databases in Historical Studies

LUO Xuan (92)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ization and the widespread of Internet, there appear various kinds of academic databases. Accordingly, the formats, structures, functions and existing environment of the carriers for academic files have changed fundamentally. As a novel kind of historical researching tool, database is bring radical transformation to the ways historians conduct their research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research work, changing the nature of every step for material collection, tracing the latest academic trend, and enriching researching sources, etc.. Therefore, databases will trigger a renovation in traditional historical studies.